

社会主义经济和中国的经验

——对经济改革的展望

SOCIALIST ECONOMY AND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A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REFORM

石川滋

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前景。

一、导 言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试图按照东欧国家的路子进行一场经济改革。尽管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已经看到了中国经济和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之间的巨大的相似之处。但是，我日益强烈地感觉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正如世界银行所定义的，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此，它在某些方面与东欧国家的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东欧国家的经济毕竟是高收入的发达的经济。虽然中国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同样的都被称为“集中管理的实物计划体制”，但由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巨大差异(1980年，中国为300美元，东欧国家大约在3,000~7,000美元之间)，这两种类型的经济体制的运行方面似乎也有重大差别。另外，同样在集中管理的实物计划体制下所进行的以下放定价权为目标的改革，在其可行性方面及最后结果上也可能出现许多不同。

然而，现在还很难通过对中国和东欧国家经济之间的系统比较来证实我的这种感觉。我不打算在这次演讲中进行这种比较。不过，根据我以前对亚洲各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包括对工业化过程中的日本所做的比较研究，我可以相当自信地说，对那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这样大差异的国家来说，它们在生产力以及制度和组织结构方面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我打算主要以这种比较的结果来证实我的这种感觉，但不做具体的比较。

我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能够相当清楚地说明中国作为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的经验。我也希望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能够推测出未来岁月

二、基本论点和概念

首先，让我从三个方面描述一下我的基本论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在一个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发展的。这种低收入阶段有两个基本特征：(a)低生产率，包括低水平的“劳动分工”或“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不足；(b)低额储蓄，这使得人们总是关心如何保护最低生存收入的问题。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广义上可以定义为集中管理的实物计划资源配置体制，但由于(1)中所描述的低收入条件的影响，这个体制的作用范围只限于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剩下的部分是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还不发达）和习俗经济（在这里，不是市场，而是个人关系决定了社会的生产、消费和收入分配）。它们作为不同的资源配置体制，要么单独地起作用，要么共同地起作用。正是由于这种混合的经济体制的存在，中国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甚至在集中管理的实物计划体制下成功地取得经济的巨大发展。

(3)目前进行的以价格管理权下放为目标的经济改革，虽然有许多非常有利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也有许多制约条件。这些制约条件植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结构中。第一个有利因素是，由过度集中造成的低水平专业化可以通过上述的改革加以纠正。第二，由于上面所提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专业化”的潜在领域已经有了惊人的扩大。通过这场改革可以更有效地实现这种专业分工的扩展。其制约条件是，只要中国

经济继续保持在低收入阶段，国营经济和习俗经济将继续起重要作用。反过来，它们也将会限制市场经济的有效部分在某些范围的发展。改革的成功很可能依赖于计划者对这些制约条件的敏感性。

由于这几个方面已经包含了许多经济学术语，因此有必要先提出一些主要概念，并对其中部分概念进行定义。

(1)资源配置是一个总的概念，它最全面地概括了经济机制的运行。从字面上理解它意味着，社会的原料、中间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总供给如何被结合在一起，生产各种不同种类的和不同数量的产品和劳务，产品和劳务是如何在各种特定的用途上配置的，产生的收入是如何在个人之间分配的。

(2)市场经济，习俗经济和国营经济是我已经提到的资源配置的不同体制形式。下面对它们作一些简单的描述。市场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社会中的每个企业和个人，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取最大利润或福利为目的从事经济活动。社会的资源配置是这种活动的结果。习俗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其中社会中的每个人根据习惯规则从事经济活动。这种规则以保护社会每个成员福利为共同目标，规定了这些成员的义务和特权——资源配置是它的结果。习俗经济这一术语首先是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使用的。它的典型形式是农村的传统村社。但是它也出现在都市地区，特别是在个人关系和终身雇佣制盛行的商业组织和劳动市场中。国营经济是这样一种体制，其中国家一般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对社会资源的配置直接干预。它有许多变形，表1只列出了两种极端的形式： C_1 型和 C_p 型。 C_1 型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下，国营经济在填补福利经济学所谓的“市场失败”缺口，并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不愿进入的地区或部门通过分配公共基金的方式提供社会援助方面只起非常小的作用。 C_p 型是指集中管理的实物计划体制下的国营经济。在这种类型的经济中，国家的作用被扩大到最大限度，也就是说国家集中了所有个别企业的决策力量，并向每个企业以实物指标的形式发布生产和管理的命令。这种类型的国营经济是苏联在战前的工业化计划时期建立的。战后，中国和东欧国家照搬了这种形式。与这种类型相对照，中国和东欧国家都想通过经济改革引入的那种国营经济，在广义上可以称为定价权下放的国营经济。在这种形式下，尽管国家仍然对一小部分影响经济基本发展过程的重要部门直接控制，但在这部分以外的经济中，国家把全部决策权下放给企业。企业将根据已经恢复的市场条件及国家规定的经营法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利润最大化法则）来决定它们的行为。国家通过税收、补贴、利率、关税和其他经济政策工具引导企业和消费者按某种事先确定的方向进行活动。

(3)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指联合使用社会给定的资源所产生的国民产出量和福利的大小(如表1所示)，

这个效率用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额来度量。收益和成本又分别由几个相互独立的因素决定。它们的价值随体制的不同有着巨大差别。反过来说，如果不考虑政治决策，社会决定采取哪种特殊的体制或混合体制将依赖于这种体制的绝对和相对效率。

在决定收益的因素中，a项是最基本的，如果不考虑体制问题，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是经济中生产力提高的基本的基础。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说也是由这一项决定的，除此之外，它还受到与这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有关的体制特点的制约，即b项。问题是，这些收益不可能在不耗费成本的情况下产生。在低收入阶段，即使抛开习俗经济不谈，这些成本也是巨大的。

很明显，在市场经济下，普通的信息成本会由于利用了价格机制而大大减少，但履行契约的成本，特别是避免被欺骗和遭受违约之苦的成本，以及应付这些实际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的成本是巨大的。因此，虽然成本的a项相对较小，但b项较大。在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下的国营经济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履约成本(即b项)可能比较小，但为了制定集中管理的实物计划收集信息资料的成本(即a项)却大得可怕。对这两种经济体制来讲，消除人们对失业和失去维持基本生活收入的恐惧的成本都是极其庞大的。

(4)不同经济成份的混合体制。市场经济、习俗经济和国营经济在这种低收入阶段是共同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是在一个混合体制中运行的。它们很少单独起作用。其原因可以用这种体制资源配置的效率来解释。在习俗经济情况下，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某一个阶段，这种经济中所增加的小额收益量就不足以让它作为一种独立的体制存在下去。但是，由于它具有减少成本a、b和c的性质，结果它将作为一种补充体制起极其重要的作用。我相信，这是它为什么仍然存在的理由。其他两种体制未能单独起作用的道理是，让其中任何一种体制单独起作用，其成本都会高到难以维持的地步。因此，几种体制共同起作用将会减少这些成本。在这一点上，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在注释3中作为例1和例2提出的两种可能的情况。然而，这些可能的情况是否会成为现实，依赖于它们的收益和成本所具有的特殊值。正如在论点(2)中指出的，我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段时间，例2中所描述的情况成了现实。不过，关于这一情况留待下一部分去作具体讨论。

三、经验事实

现在讨论正题，我打算研究一下与上面所提到的三个基本论点有关的中国经济的经验事实。

1. 不发达的社会“专业化”

首先，论点(1)明确地绘出了低收入阶段的三个

特点。它们是，低水平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不足以及人们对收入没有保障的恐惧。我的研究将集中在“专业化”问题上。人力资本和收入的无保障问题留待以后分析。

众所周知，“专业化”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用以下过程来估价。完全为了生存或只在偶然情况下能提供给自己剩余产品的生产者发展成为部分时间被商业化的生产者，最后成为完全商业化的生产者。这是产品专业化的完成阶段，然后由于所谓的生产过程增长的“迂迴”性，专业化从制成品发展到生产过程、零件和组装。这是工序和零件的专业化。在这一阶段，要素市场的专业化也在逐渐地发展。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专业化”的发展可以用以自然条件的差别为基础的专业化向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专业化发展来估价。在典型的情况下，前一种专业化可以在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交换中看到，后一种可以在制造业自身的工业品交换中看到。在这方面，可以列举出三个经验事实。

第一，中国的农业仍处于一种高度的维持生存的生产阶段。这种维持生存的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农业产出的主要部分是为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农作物，即粮食；（二）农业部门的粮食市场化比率非常低。最近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这个市场化比率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时期一直很低。1979年，它只有21.7%，扣除给缺粮农民的返销粮，纯市场化比率只有粮食总产量的15.6%。换句话说，中国粮食生产中，大约85%是由生产者家庭自己消费了。这种情况也从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比较高这一事实反映出来，1979年这个百分比为73%。这意味着中国的农业向完成“产品专业化”方面的长期过渡刚刚开始。

为什么市场化比率如此之可怜？原因在于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整个时期，土地生产力有了稳步增长，但农业劳动生产力仍然非常低而且停滞不前。这种低而且停滞的农业市场化比率，长期以来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正如人们很容易理解的，在给定的、作为基本“工资品”的粮食的这种市场化比率条件下，正在兴起的现代工业部门的增长率必然受到农业部门增长率的限制，而后者在通常的环境下必须是适度的。

关于仅能维持生存的问题也可以用整个农业生产中牲畜生产的百分比很低来说明。如图1所示，1979年它只占大约16%。接近代的食用牲畜的饲养方式，牲畜的饲料越来越依赖于粮食。因而这个百分比的增加意味着粮食产量中用来喂养食用牲畜的部分日益增大，农业生产的“迂迴”性和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就此而言，中国牲畜生产的百分比之低可以看作是农业专业化程度低的另一个证明。图1中，牲畜生产的低份额正好与农业劳动力在整个经济总劳动力中所占的高份额形成了对照。在同一图中还画了七个东欧国家的情况。这些情况说明东欧国家牲畜生产在总的农业生

产中所占的百分比都非常高。同时，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份额都非常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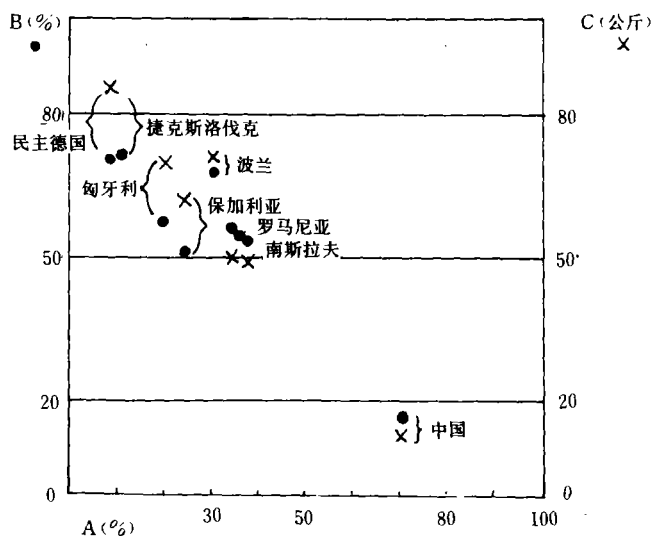


图1. 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A〕和牲畜产品价值占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比〔B〕或按公斤计算的每人的肉消费量〔C〕之间的关系

表1. 不同资源配置体制的效率

	A	B	C ₁	C _p
	市场 经济	习 俗 经济	国 营 经济(1) 对A的 补充	国 营 经济(P) 集中管理 的计划
1. 收益				
a 潜在“专业化”能力的实现	中	小	大	大
b 合理的收入分配	小或负	大	相对大	大
c 刺激的正效应	中	小	—	小
2. 成本				
a 获取市场或经济环境的信息	相对小	最小	—	大
b 消除交易中的风险	大	最小	—	相对小
c 清除人们对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恐惧	大	最小	—	大

注：

- 此表只涉及低收入发展阶段的经济。
- A—C代表挑选出来的几个资源配置体制。A、B和C中的任何一个要么是以独立的体制起作用，要么是在其他体制的补充下起作用，要么作为其他体制的补充体制起作用。表中给出的收益和成本量只与每一种体制单独和独立运行相关。
- 不同体制之间的合作可能是由于某种客观必然性。
例1：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当它单独起作用时，成本2 b和2 c可能会非常大，使社会和个人无法忍受。习俗经济是作为它的一个附属体制存在，以补

充这些不足。国营经济(1)由于某些明显的原因也是必不可少的。

例2:在这一阶段,当国营经济(P)单独起作用时,成本2a和2b可能会高得难以容忍。因此,集中管理计划的有效范围会缩小到政府资源(包括人力)能够支持的地步。剩下的缺口由市场和习俗经济来填补。

众所周知,东欧的一些国家自六十年代末以来已经面临着严重的食品问题。特别是在波兰,由于这一问题甚至酿成了政治危机。虽然正如这些国家的高专业化程度所反映的,他们的农业生产率的发展阶段比中国要高得多,但食品短缺的问题还是发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种食品问题不是指中国生产力发展阶段中所特有的粮食问题,东欧国家在很久以前就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这些国家的人民愿意改变他们的嗜好,直接吃粮食,而不是通过食用牲畜的胃来接受粮食,那么将不会出现食品短缺的问题。但如图1所示,他们不愿意减少对肉食的高水平消费。虽然这有点离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最近中国农业生产的上升会解决古老的粮食问题,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有效地处理这种食肉问题。有迹象表明,这个问题可能在以后几十年中出现。

第二,生产单位仅能维持生存的特点不仅限于农业。例如,在煤的生产中,除了大、中型煤矿外,总产量中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来自许多分散的自给生产单位。包括生产合作社,甚至农村的个体家庭。在目前中国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产煤省——山西省,这些小煤矿散布在总共100多个县中的70多个县里,其产量占1983年煤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事实上这些小煤矿是混杂在大型采矿企业的煤田中的,因而使后者的系统发展和生产极为困难。

在现代工业部门中,产品专业化当然是接近完全的,但作为整个工业国家生产力提高的组织基础的工序和零件生产的专业化却完全落后了。其部分原因在于实行集中计划管理国家所固有的体制问题。正因为如此,东欧国家在这方面也是十分不发达的。但中国的基本事实是,许多主要的国营企业几乎都是在1949年以后才刚刚开始建立的,因此只能从事封闭型生产,没有机会同外部相互关联的产业合作。在机器制造业中,这种情况表现为完全独力生产的工厂所占比率非常大。根据1976年的统计,从事成品机械制造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的大约80%的企业是完全综合性的厂家,它们生产全部的零配件,并从事锻造、铸造、热处理以及其他基本的工序。据说,其他部所属的机械制造企业的这个百分比甚至更高。为了改变这一状况,1964年实行了国营企业之间加强“专业化合作”的政策,其后这一政策又不断地被重申,但始终收效不大。

与此有关的另一种衡量专业化发展程度的方法是零部件、加工原料、工具和模具以及最终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尽管国家级、部级标准的数量已有所增加,

但仍然是有限的。低水平的“专业化合作”和不发达的标准化程度没有给机械制造者带来很多困难,但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安装在三台相同型号拖拉机上的40马力柴油发动机分别是由洛阳、广州和新疆按不同规格制造的。它们大部分的零配件,甚至油泵和油咀,都不能互换。这给保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结果许多这样的拖拉机就废弃了。

第三,关于生产要素市场专业化的问题,我可以说的是,现代化劳动市场的形成仍然很缓慢。目前,现代的工资性就业只占总劳动力中的25%。其中只有不到20%的人从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中获益。五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初之间,构成劳动力主要部分的农民在各自地区组织成生产队,并部分根据他们的劳动贡献,部分根据家庭规模和构成获取固定工资。这是一种生产合作社内部的收入分配制度。结果,公社制度就与社会保险的某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不过农民必须承担收成波动的风险。1981年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生产体制实际上返回到合作化前的家庭耕作形式。

我认为上述已经相当清楚地说明了到目前为止的中国低水平的专业化状况。但是在结束关于这个题目的讨论之前,还必须就如何把我们的讨论与G.W.斯金纳(G. W. Skinner)教授关于初级商品流通网络的著名研究协调起来做一些说明。斯金纳教授的这一研究曾使他强调,战前中国的市场体制已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正如表1所示,市场经济的发展应与专业化的发展正相关。因此,好象我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专业化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看法与斯金纳的看法非常矛盾。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两种看法的不同之处只在于,斯金纳是从商品流通的空间结构去构想市场经济或专业化的发展。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化以前的中国,而我们是根据战后工业化过程中中国商品生产的组织和技术结构来构想市场经济或专业化发展的。因此,斯金纳感兴趣的是初级和高级水平的交换体制网所覆盖的农业区域范围的大小。而我们关心的是由刚刚够维持生存和(或)部分产品被商业化的农民出售他们剩余产品的阶段如何向下一个阶段,即专业化水平日益提高的生产者提供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支配产品市场的阶段的过渡。我们也关心生产本身怎样才能逐渐依赖于厂家之间不断延伸的合作链。这种专业化合作关系受到充分发展的金融和劳动市场的支持。因此,虽然从斯金纳的意义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市场经济是发达的,但从我这次演讲的角度看,却是相当落后的。在后一种意义上,甚至现在,专业化仍然未得到充分发展。

2.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习俗经济

现在我们讨论论点(2),即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由集中管理的计划型国营经济,还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和习俗经济组成的一种特殊的混合经济。首

先,关于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我有一种感觉,这就是至少在六十年代末以前,这个体制在促进一般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创立现代工业部门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在能够拥有在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所无法见到的规模巨大的重工业体系。在这一点上应该强调指出,虽然人们常常认为决策权“过度”集中于政府是中国国有产业严重缺乏效率的根源之一,但是在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下,这是唯一的选择。大量的大、中型国营企业毕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没有任何累积的管理和技术知识的基础之上,在厂家之间缺乏横向联系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很自然,只能通过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活动进行细节的并且是专断的指导。人力的短缺加剧并延长了这一状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似乎完全有理由将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优先分配到政府和研究与发展部门。结果处理企业各种管理问题的决策权不可避免地集中在政府的手中。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由于人力短缺(或人力资本的不足)和其他资源的限制,又阻碍着计划经济管理范围的扩大超过一定的限度。内向的贸易政策确实已经使受教育的和有经验的人员的短缺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特别由于后一个因素,据说,大约有一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另外,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大约一百三十万大学生基本上被看成是质量低劣的,这些人构成了中国大学毕业生总数(三百三十万人)的38%。然而,人力资本的短缺,作为低收入国家经济的一种共同现象,主要是结构性的。正因为如此,虽然这些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已大大超过了文化大革命高潮之前的水平,它甚至还满足不了社会对它的年需求量的一半。限制计划经济发展的另外两个约束条件是,限制有效益工程项目的数量和规模大小的预算资金的短缺,和为了加强计划集中管理必然引起的收集信息的巨大成本。

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受计划集中管理的部门只限于国家计委的物资分配、商品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所包含的那些企业和组织(即核心部门)。但是据一位权威的政府经济学家介绍,虽然由国家计委直接控制的商品总价值量占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但品种却只有几百种。再有,那些根据详细的信息进行控制的商品据说只有几十种。此外,根据最近的信息人们发现,即使在那些受计划集中管理的核心部门中,甚至用于保证宏观经济的几个重大目标协调发展的一种最基本的计划方法,即,物资平衡法,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

从广义上讲,接受计划集中管理的部门包括所有那些通过政府预算支出获得资金的部门。但是在这些部门中,政府的控制是有针对性的;这就是说,只有那些党的分支机构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才被注意,并被提到他们每天召开的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来。政策也得不到连续一致的贯彻。

那些广义上接受计划集中管理的部门以外的部门,甚至那些核心部门以外的部门都可以统一地被称作不受计划管理的部门,这个部门同最近的时髦名词,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中的“第二经济”,相类似。不论叫它什么,把它看成一个单独的部门是为了研究这个部门中资源配置的法则。任何一个经济领域,如果其中的经济行为不是处于停滞状态,就会有资源配置法则在其中起作用。许多人认为,在不受计划管理的部门中,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市场机制。我很有保留地同意这一看法。

我的观察表明,在不受计划管理的部门中,市场机制只是在某个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并且仅仅是微弱的作用。当然我可以举出许多例证,例如,政府的农业价格政策对确定产品结构或特定产品的产量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这些影响主要在下面的情况下才是重要的:产量的下降是由于价格不能弥补大多数农民的生产成本这样一种不合理的价格政策引起的。作为这种情况的一个例证,1978年价格改革之前,国家的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收购价格非常之低,以至于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奇特现象,“生产队增产的粮食越多,这个生产队就变得越穷”。

在相反的情况下,即为了促进生产和投资而提高价格或直接分配预算资金,结果出现了许多阻碍达到这一目的的物质的和组织的因素。诸如,缺少防洪、排涝、灌溉和排水设施,缺少为购买现代化投入品进行筹资的社会服务机构,以及化肥分配渠道的不合理。1978年农业价格改革时期,产量递增效应起了明显的作用。从基本投资方面来看,很可能是因为存在一个过去建设累积下来的大量未投入使用的生产力的蓄水池。

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次的制约因素出现在已增产的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的市场方面,也就是说,出现了仓库、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的短缺。根据最近的报告,全国政府采购的粮食堆放在露天的数量达2500~3000万吨(占到目前为止政府采购粮食总量的大约30~40%)。到1983年底为止,全国粮仓总容量为一亿吨以上。当然,政府正在努力扩大仓库容积。但是目前只计划在三到四年内增加2000万吨容量,其中包括非粮食方面。实际原因是预算方面出现了约束。

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不受计划管理的部门中起作用的宁可说是习俗经济。正如在前面假定的,在处于低收入阶段的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中,习俗经济有助于对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不健全的资源配置功能加以补充。正如处于同一阶段的市场经济中,习俗经济有助于对市场经济不健全的资源配置功能进行补充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习俗经济实际上起着补充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和不受计划集中管理的部门中的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面,我打算从两个方面来证明这个看法。

第一,在农业部门,尽管还处于一种维持生存和

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人口的巨大增长(大约为三亿人左右)，是由日益提高的土地生产力养活的。处于维持生存阶段的农业还向中国城市增加的一亿人口提供了足够的剩余产品。中国中南部的许多地区，村社制度的存在，是农业部门在人口压力下得以生存并贯彻高度强制性的采购定额制的基本原因。在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这种传统村落不存在的地方，如在中国的北方，农民通过协商或根据习俗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假村社”的团体。这种团体的地理范围与中国传统的自然村落、现在的生产队的地理范围是一致的。生产队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一般是基本的生产和管理单位，在这些生产队中，平均分配成为一种制度。

在人为形成的生产队能够发展成为假村社之前，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首先，那种过去曾阻碍村民之间合作的地主-佃农或其他形式的阶级关系必须被消灭。其次，生产队和(或者)较高级组织的官方领导应替地方团体说话，并因此而赢得地方农民的信任。没有这些条件，团体的协议就不能实现，而由上面强加给生产队的平均主义协议很可能引起这样一种结果，即地方农民会玩一种两难的游戏。这是指，在生产队里的工作是按平均主义的原则支付报酬的情况下，很可能至少其中的一些社员喜欢偷点儿懒，同时，又小心翼翼地防止这种行为被他人发现。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每小时劳动的报酬对于勤勉工作的人和对于偷懒的人毕竟是一样的。正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普通社员不愿意勤勉工作，因为这样做将使他们遭受许多损失。结果大多数的社员都喜欢偷懒，从而队里的产量大幅度下降，而每个社员的收入甚至可能会下降到维持生存水平之下。

如果地方干部失去了农民的信任，同样的结果也可能发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区之间共同的事业，如灌溉和防涝，将很难有效地发展。

第二，在工资-劳动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非农业工人最关心的是如何保住他们的工资和收入。中国政府在有组织的部门中实行的就业和工资政策，由于包含了一些传统就业习惯的重要成份，因而解除了这种担心。这种作法虽然保证了有组织部门中的每个正式就业工人工作的永久性和他们的最低生活来源，但是，他们都必须接受平均主义的工资。第一个系统地表述这些想法的政府政策是1950年的“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后来采取的各种措施实际上是强化这一政策。不过要应用这一政策至少会遇到一个严重的阻碍，这就是整个有组织部门在长期工作有保障这一前提下对工人和工作人员的雇佣能力很有限。因此，作为先决条件，这一政策迫使政府把有组织部门作为“保护区(sacred zone)”，并根据事先细心安排好的计划招收城市青年工人并对农民流入这个“保护区”进行严格的控制。这一政策实际上得到了严格的执行，结果中国变成了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少有的国家。在

这个国家中，人们在大城市中找不到任何大的贫民窟或非法占住区(1972~1974年在加尔各答，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7%；在马尼拉占36%；在曼谷占8~15%；在南朝鲜占29%)。如果“保护区”的人口由于任何原因而过度膨胀，在这种就业政策下很可能会出现生产率下降、工资支山膨胀以及利润减少这样一些严重的经济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以来，这种可能实际上已成为现实。可能由于政治原因，新领导班子准许了被下放到农村公社插队的大约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返城，城市失业青年泛滥。政府针对这一情况采取了相当传统的措施。它命令所有企业、政府部门，甚至大学和研究机构不惜一切地照顾这些在业人员的家属和亲戚的返城青年。1984年，失业人数大大地减少了，但各城市几乎所有单位的原来就已经很严重的在业人员过剩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中国的第二大工业省——辽宁省，到1981年，按这种方式吸收了220万青年，而1978年的职工人数为550万。据说1982年辽宁省的苦恼之一是国营企业的200万过剩职工和全省的100万失业青年。总之，“保护区”似乎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事，这是当前经济改革必然要遇到的另一个问题。

我想，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段时间里中国特殊的混合经济体制，以及使这一体制必然出现的结构原因做了非常清楚的描述。从根本上说，这种混合体制是在中国经济的低收入和低生产力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种体制结构作为中国从事大规模有目的的工业化运动的基础是相当成功的。集中管理计划体制的许多弱点由于市场经济和习俗经济的存在而得到弥补。然而，在这种低水平的专业化阶段，当集中管理的实物计划体制在国民经济的一个狭窄范围内得到应用时，具有某种任何其他体制所不能替代的明显的优点。

我也希望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我已经相当清楚地阐明了人力资本的短缺以及人民对工作和收入保障问题的严重关切。这些都与解释混合体制的出现有关。阐述这两个问题是我在前一部分给这一部分留下的任务。

3. 当前经济改革的有利因素及约束条件

论点(3)涉及一些可能决定当前中国以定价权下放为目标的经济改革前景的因素。这个讨论不仅指出了改革的有利因素，也指出了不利因素。因此，这部分的任务相当明确：确定这些因素是什么。

在有利因素中，我首先注意的是由于过度集中造成的对专业化的阻碍。据我看，上面所讨论的低水平的专业化大部分是低收入发展阶段的一种现象，因而是“结构性的”；但由于集中管理计划本身的过度膨胀也造成了对已形成的“专业化”的阻碍，因而它又是“政策性的”。我也认为，对后一种情况可以相当容易地通过权力下放的改革加以纠正。但是1978年以前的

那段时间，市场被关闭、取消或削弱的情况不能与专业化的“政策性”受阻相提并论。为了明确地说明这种差别，我把后一种情况根据导致各种具体事件发生的不同原因分成三种类型。

(1) 由于政府或党的干部们提出的意识形态的或其他非经济的理由，而引起的对市场的反感造成的市场功能减弱——对初级产品市场、农民副业生产以及自留地的限制，对手工业和服务业活动的限制，以及禁止雇工。

(2) 由于价格管理和其他经济政策方面的错误或低效率造成的市场功能减弱。例如，在收购、批发和零售价格形成中地区和部门之间不合理的差价或未考虑已增加的生产成本；可替换商品之间的不合理的相对价格；官僚本位主义对商品、原料和技术在省、甚至县及各部门之间的转移设置的障碍。

(3) 由于利用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来控制资源配置，或强制推行一种更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结果减弱或取消了私人市场的交易和资源配置功能，从而造成了市场功能减弱。许多市场都受到这种类型的影响。所有三种类型中，这种类型对市场功能的影响最大。

在这三种类型的市场功能减弱中，第(1)和(2)种类型与“专业化”的政策性受阻有关，但是第(3)种类型就不一定如此了。因为计划经济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在市场经济下形成的分工结构；另外由于它已经成为后来“专业化”发展的基础，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有利于目前经济改革的第二个因素的一部分。

如同我们在论点(3)中看到的，第二个有利因素是：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专业化”实际的和潜在的能力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第二，这种潜在的“专业化”，在定价权下放的体制中要比在集中管理的实物计划体制中得到更充分的实现。关于第一点，可以看到许多新的趋势和力量，这些新的趋势和力量要么已经出现并实际扩大了专业化的范围，要么是提高专业化水平所必需的。其中：

(1) 对食品和其他农产品具有大量需求的现代部门已有了巨大的发展，这种情况反过来必然导致对化肥、抽水机和其他农业所需的工业投入需求的增加。同时，非农业的就业机会也增加了。过去高度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现在受到市场经济的极大威胁，因而不得不对盈亏状况越来越敏感。我认为这种变化从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就逐渐地发生，七十年代中已经相当明显。

(2) 工业产出量的巨额增长使得建立并扩大厂家之间生产上必要的专业化合作越来越紧迫。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在1964年以后作为一个政策性问题已明显地引起人们注意。

(3) 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已经提高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国家政府继续搞集中决策已显得越来越不经济。因此，要求在现

存单位中利用这些能力的呼声不断高涨。

(4) 在官僚主义对地区间商品流通进行“封锁”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地方工业，明显导致了由“重复生产”和生产成本递增而引起的低效率。这种情况从七十年代起变得越来越严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一些新的趋势已经指出了改革的方向必然是朝着市场类型发展，但下面的演绎推理可以得出更具一般性的结论：定价权下放更有利于实现新的潜在的专业化分工。因为经济中的专业化结构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有效地集中管理实物计划所需要的收集和管理信息的成本已增大到无法负担的地步。因此，这种体制本身变得效率极低。用表1来表述就是，C₀型的国营经济必须让位给另一种类型的经济，它与市场经济和习俗经济结合的可能性最大，从而使整个体制再一次取得合理的效率。

在估价利用这些有利因素进行市场调节型改革的可行性时，还应参考由低收入和低生产力条件带来的对改革的阻力。关于这些阻力问题，大部分我们都在论点(1)和(3)中提到了，只有一点值得提醒人们注意。这点与一直就存在的计划人员短缺问题有关。当计划朝着定价权下放的方向变化时，以制定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基础的经济管理和计划将变得日益重要。随着人们对这种管理方法的不断重视，社会对中国目前还未曾出现过的大量新的计划技术和新的经济理论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将会带来一类全新的问题和对改革的全新的阻力，这些是进行任何现实主义的改革应该特别注意的。

四、结束语

最后，我想讲两点作为结束语。

第一点涉及我这次演讲的主题，即关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我认为我已经相当清楚地表述了我的看法。这就是，中国的经济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我已从三个方面阐明了中国的特点：低水平的专业化程度，人力资本的不足以及人们始终关心是否能获得有保障的工作和收入。正是由于这些结构性的特点，加上中国五十年代引进了苏联的计划体制，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一种由集中管理的实物计划经济、还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和习俗经济组成的特殊的混合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虽然这种看法在许多方面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我敢说，有一点会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这就是我们关于比较经济体制(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的研究从分析结构上讲，主要关心的是发达国家经济体制的比较。我们应该研究出一种能够解释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现象的分析结构。为此，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习俗经济、国营经济以及市场经济、习俗经济、与国营经济的最优混合体这样一些概念是有用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第二点是关于当前经济改革的前景。针对这个问题我这次主要讲到,中国目前的经济中存在着对改革非常有利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许多重要的阻力,它们同样植根于当前的经济之中。这一看法的政策含义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计划者应该巧妙地运用这些有利因素,而极力避开不利因素。关于不利因素,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低收入发展阶段,引入一种市场调节机制不可能替代国营经济的作用。这种国营经济甚至在改变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时是必不可少的,不论这些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非社会主义的。同样,它也不能替代习俗经济的作用。后者在消除那些处于维持生存水平的人们对失去工作和收入不断产生的恐惧心理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下面的一点是,想要估价强调市场作用的改革的效果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为了进行这种估价所必须使用的过去的经验资料不仅与体制因素有关,也与非体制因素有关。使用这样的资料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失真。我感到,目前关于改革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种失真,失真的地方似乎是夸大改革带来的有利影响。

在这一点上我想强调的是,不过高估计中国目前开展的经济改革与最近中国经济形势高涨之间的直接联系是明智的。1978年晚些时候开始的经济改革,其直接动机表面上看是为了克服中国经济学家称之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出现的“经济危机”,但在这场危机背后起作用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除了上面所概括的体制原因和“调整政策”(与“改革政策”相区别)所针对的严重失调的经济结构原因(如受抑制的个人消费水平和各种各样的工业瓶颈)之外,还有(1)领导人和计划者不断渴望高速增长,这种高速增长引起了高压下的“短缺”经济;(2)制定和执行计划和政策过程中的技术错误(如不完全和不恰当地使用“物资平衡法”,特别是许多年来在制定钢的生产指标时更是如此);(3)国防开支增加的负担(如1965~1975年之间三线建设投资用去了基本建设支出的一半以上);(4)七十年代,党和政府的政治基础迅速减弱,这一项似乎最为严重,地方干部丧失纪律性并日益消沉,干部和农民“群众”之间相互信任的消失,对工人和知识青年采用非物质刺激的教育方法的效果和威力减弱,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

“调整政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似乎也对当前经济形势高涨起了一定的作用。审慎地降低征购指标、工业生产指令性指标及总的经济增长率的作法似乎已经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因此,为了估价强调市场作用的经济改革对经济形势好转的真正贡献,必须首先设法把政策变化而不是体制改革带来的有利影响分解出来。

例如,只有当家庭承包制的实际影响与农村地区的政治自由化的影响(它的结果是自由选择产品结构和减少生产队的收入和财产的平调)、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并降低征派购定额等项经济刺激措施的效果,

以及进口的1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实际影响区分开来,才有可能识别家庭承包制对产量增加效应的贡献。所有这些措施几乎是在1978年,特别是在“给全国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指导下同时形成的。我还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改变这一休养生息政策的消息。

在思考经济改革前景的时候,我没有涉及政治方面的制约因素。但是根据东欧国家的经验,这种制约因素很可能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其中特别重要的似乎是因大批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和工人对改革的抵触情绪而造成的制约条件。这些人在现在体制中的既得利益很可能在改革中失去。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制约因素不是我的题目,我关心的只是经济方面的因素。正是基于这种看法,以及我对以下放定价权为目标的中国经济改革完全支持的立场,让我以下面的话来结束我的演讲。

从基本结构的层次上看,生产力和经济体制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战略,就其所采取的步骤和发展速度来讲可以是革命性的。但这并不能使基本结构所固有的渐进过程变为革命的过程。政府的战略如果与现实相符的话,可以促进这种渐进过程并加速它的变化,但仅此而已。即使一种革命性的战略被强加在基本结构的渐进过程之上,也无济于事,甚至会打断这种渐进过程。正如我们在过去,特别是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因过度集权所产生的后果中看到的,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我希望在中国当前的这场经济改革中,计划者要格外小心,以防止这场改革变成另一次革命的尝试。

(丁 谦译,董辅初校)

(上接第39页)

(3)材料的选择。试验中采用的材料,包括低密度的水泥、纤维玻璃、轻钢、混合塑胶和橡皮。

(4)安装方法。试验中的安装方法是将交换器安装在半浮沉的船壳上,再以铁缆拴住。还在考虑中的方法有,由海底向上建高塔,以供水管及发电设备之安置。

(5)经济价值。欲使这计划有经济价值,其发电量至少须超过40,000千瓦。这样大的装备,必须有每秒抽水3000立方米的泵,海上还须设有可以载员500,000吨的台架,并须能承受海浪的冲击。

(6)环境污染问题。大量汲取海底的冷水上升,换取等量的热水下降,其对深海生物的长期影响,尚无法估计。

总之,上列各问题都很严重,但如一旦成功,收效也很可观。例如在墨西哥海湾里装置一座年产3亿千瓦的设备,则至少可以代替年耗 4×10^9 桶原油的燃料,自然值得考虑。海南岛和台湾南部,已属亚热带,开发这种资源,似有可能。

陆